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12

中国农民工研究“半世纪”： 基于个人的调查与经验

周大鸣

(中山大学 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周大鸣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也是我国规模性农民工群体刚开始兴起的重要时期。一直以来,周大鸣持续关注着中国农民工在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国内主要涉及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与转型、“散工”、城市少数民族、城市新移民、农民工与城市化等;国外主要关注海外农民工的研究。当前,农村大批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是主流,进城农民工分布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仍然跟农民工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农民工;个人研究;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083-09

有关农民工的研究现在仍然是一个热点,“农民工”一词伴随着改革开放为学界普遍使用。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为什么是基于个人的观察与研究?因为笔者于1978年到中山大学求学,耳闻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巨大变化。后来笔者做珠三角地区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的集聚是伴随着该地区的发展而来的。

20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现新的调整。1984年,城镇化举措首次施行,这意味着我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①。珠三角地区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趁着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在吸引外来资本条件下形成“三来一补”产业结构,伴随着产业集聚带来流动人口聚集,该地区规模性农民工群体开始兴起,从而促进周边地区城镇化发展,最终形成城镇化发展的“珠三角模式”。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交通主要靠火车,火车站经常人山人海,这也反映了刚兴起的流动农民工对我国交通造成的巨大压力,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注。

一直以来,尽管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并对我

国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主流媒体和民间媒体大多忽略了他们的工作与贡献。2014年阿里巴巴去美国上市时邀请了几位中国农民工并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该杂志如此描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说明西方世界对中国农民工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反观国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当全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支援武汉的医生、护士等值得歌颂的人群时,维持社会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普通群体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2020年3月,中国一位快递员再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这位快递小哥作为中国亿万农民工的一份子,在疫情期间他需要接触不同的人,为武汉市民代购和代送日常生活用品。快递员在疫情暴发高峰期跟医护人员一样面临着各种风险,甚至风险更大。

因此,笔者很早就有一个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三十年是靠农民工发展起来的,后三十年可能要靠培训农民工而得以继续发展。实际上,中国

收稿日期:2020-12-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8JJD84),中山大学培育项目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移民与都市化、族群与区域文化、人类学应用研究。

^①南方都市报:《变迁三十年:珠三角城镇化30年编年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快速的发展,包括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突飞猛进,这都跟中国勤劳坚韧的农民工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笔者曾说过一句名言:“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农民工搭建的。”^①

一 中国农民工的产生与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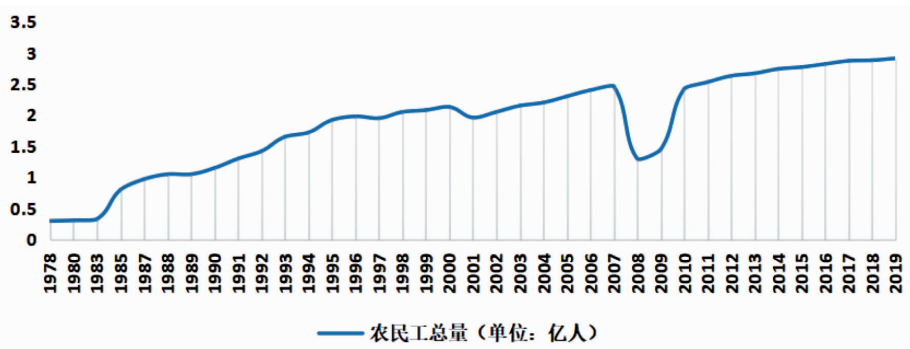
农民工产生的背景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矿山招收农民并开始出现“农民工”一词。70年代,农村户口的社队企业工人兴起,其实也是农民工。到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开始进入非农产业,包括矿山工人、建筑工人、个体工商户等。当时,我们一般把农民工分成三类:一种是离乡不离土,即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到他乡还是耕种土地;一种是离土不离乡,他们“洗脚上田”,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还是在本地的工厂里工作,典型的是珠三角地区农民由“种田”转向“种楼”;第三种是离土又离乡,直接离开乡土到外地去务工或经商。

目前在国务院《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中对农民工的最新定义是:“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可以看出,国家在统计该群体时通常关注的重点:一是户籍,二是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工作,“农民工”也延伸出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等概念,如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是指年

末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我国规模性农民工群体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叶达到高潮。《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规模约2.91亿人,即在中国14亿人口中有将近3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一家算三口人的话,那差不多9亿人跟农民工有关系,相当于中国三分之二的人跟农民工有关系。

当前,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年轻劳动力人群外出务工,老年人群留在农村继续务农,有学者将其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②。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农村家庭生计模式仍是依靠外出务工来增加家庭收入。2006年,笔者根据在江西做的田野调查资料提出“打工经济”的概念,探讨了农村劳务输出与打工经济的关系,这种靠外出务工获取现金收入的“打工经济”在农村家庭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比重^③。在农民工兴起的初期,人群的空间流动主要来自人多地少的农村及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早期输出的省份有四川、湖南、河南,后来江西、湖北、重庆、安徽等省市也开始大量输出农民工。农民工的主要流向则是大中城市和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例如2019年珠三角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已达4418万,实际上已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流动总量的变化趋势看,2008年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一个凹点,主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又开始恢复,以后一直平稳增长,可以看到,农民工从几百万人到几亿人的增长变化过程(见图1)。



数据来源:(1)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次《中国人口普查资料》;(2)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9年)》。

图1 改革开放40年农民工流动总量变化(1978—2019)

①周大鸣:《中国农民工研究三十年——从个人的探索谈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②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③周大鸣:《农村劳务输出与打工经济——以江西省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二 中国农民工的演变历程

基于个人的观察和研究经验,笔者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演变进行大致分期:第一个阶段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农民在本地的社队企业中工作,生产队记工分。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号召,大量的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下乡通常是由学校、企业或街道组织。特别是与当地农村有联系的大型国企要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所以,在当地办的社队企业就会承接国营工厂的零件加工、农机修理等。费孝通先生在“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研究中提到,社队工业产生于我国大城市工业遭到破坏的动乱时期,大城市工人下乡与农村社队结合,形成各种小规模的加工工厂,大批本地农民纷纷进入这些农村小型工厂务工,费孝通先生称这部分农工结合的人群为“务工农民”^①。实际上,这一特殊时期社队企业不仅存在于苏南农村,在全国各地也已经比较普遍,并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此时,政府也开始设置社队企业办对其进行管理。因为社队企业属于公社或大队,仅有少量的技术人员,如外聘的业余工程师星期六或星期天上上班,大部分工人还是本社的青年。以前在人民公社里生产队都是采用工分制分配方式,到年底进行核算,即把一年的收入除去成本,最后看每一个工分可以分到多少钱,通常在农村是以10个工分为一个整工。相对较好的生产队可能一天10个工分可以赚1块钱,较差的生产队可能一天只有几分钱,折去平时花费的粮、油、花生等,一年下来可能分不到钱,甚至还有可能收折相抵是负数。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即乡镇企业兴起或小城镇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有很多社队企业转为乡镇企业,工人还是本乡的农民,但已经从工分制转为薪酬制,这一时期大部分地方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乡的农民一部分在乡镇企业工作,一部分到国有企业去当合同制工人,所以当时也有不少学术文章和相关政策,在讨论怎么清退这些工人。还有一部分农民到本地的对外加工企业工作,例

如这时期的珠三角地区外来工进入“三来一补”这类由外来资本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费孝通先生在关于“小城镇、大问题”的讨论中曾多次提到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农村“窝工”(剩余劳动力)已经相当严重,人多地少导致农民实际不是在“挣工分”,而是开始“抢工分”,费孝通先生将这种内部竞争压力视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内驱力,乡镇企业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力并成为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出路^②。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国家在1988年、1991年有两次短暂的经济调整。国家提出对经济进行整顿调整,很多企业开始裁工,大量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出现了“民工潮”,冲击大城市。当时一些报纸上都是“民工潮冲击武汉”“民工潮冲击长沙”“民工潮冲击上海”这样的标题。这一时期政府的态度是把农民工视为“盲流”,用了“围追堵截”四个字。当时农民工大量涌入确实给城市带来一些困扰,主要原因在于1989年国家经济发展突然收缩并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农民工难以找到工作,引起一系列问题^③。例如在广东,大量农民滞留在车站、码头等地露宿流浪。但是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开始能够容纳大量农民工的流入。这一时期农民工有几个特点:一是跨省跨区域的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开始从过去在本乡本土的流动转向跨省跨区域的流动,尤其是南下广东,或者是到东部沿海苏南、浙江、福建,例如泉州一带打工的人就特别多;二是农民工季节性的流动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工在农村还有土地要耕种。农民工会遵循农时安排行动:每当农忙时回乡耕种,外出多发生于农闲时。因此,每当春耕、秋收后,就会出现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形成“民工潮”^④;三是工资制度改革,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度。由原来的月薪制改成计件制的工资制度,多劳多得。当时农民工大多是单身青年,基本上没有随迁的家庭成员,这也是早期农民工的特点之一。

珠三角地区比较特殊,费孝通1989年提出的

①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八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②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③周大鸣:《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动人口研究》,《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

④池子华:《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珠江模式”^①,强调其特色是“前店后厂”。“前店”指香港、澳门地区,“后厂”是在珠三角地区设工厂,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珠三角地区转移。这种劳动力企业的最大特点是自动生产线,每个人只在自动生产线上做一道简单的工序,对技术的要求不高,但能够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当时,笔者去珠三角地区这类企业做调查时,发现一家玩具服装厂有几万名工人,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武钢等大型国企,副部级企业或正厅级的企业才几万名工人。当时类似服装厂的企业在珠三角地区很多,可想而知珠三角地区容纳了多么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此外,当时的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和农业,少量从事商业和运输服务业。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规模的建设时期,制造业、建筑业发展很快,吸纳了大量的工人,但仍然有一部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从事农业。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中国农民工的发展有一个过渡时期,笔者将其视为农民工发展的第四阶段。该时期中国的人口流动经历了从“盲流”向“自由流动”、从无序向有序的发展过程。在此之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是将农民工视为一种盲目的流动。然而在这一过渡时期国家正对人口流动的政策进行调整,即有序地引导人口的流动。广东甚至还组织粤北的农民到珠三角地区务工。农民工的流入政策也开始完善,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也开始从负面评价转向正面评价,农民工迅速地开始规模化流动。1994年到2008年,是中国规模性农民工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时代。如政府加强管理,农民工持“三证”上岗,即身份证、暂住证、流动就业证,18岁到49岁的女性还必须提供计划生育证明。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类三资企业发展快,农民工的数量达到空前的规模,他们主要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福建的沿海城市,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开始完成。

该时期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到新生代,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进行研究,内容涉及新老农民工的总体状况,与土地、家乡的联系,职业选择状况,对城市生活方式

的接受,社会交往,自我认同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②。城市产业从制造业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时候农民工的流向不仅是留在建筑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而是大规模地向第三产业转移。而且农民工的年龄持续增长,夫妻共同外出,子女随迁进入城市的变化。

第五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伴随城市经济结构和人口流动政策的转变,农民工群体也一直在流动、分化和转型。农民工在企业里面的流动日益频繁,这个时期常提到“农民用脚来投票”和“转工”,即一个农民工在不同企业间不断地流动就业。跨企业、跨行业的流动加剧了农民工群体内部差异与分化,从群体整体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劳工型,指完全出卖劳力;技术型,指有技术,如开车的、挖掘机、吊车等;业主型,指经营小商店、小超市,或拥有挖掘机、出租车等生产资料;资本型,指拥有资金投资企业、经营企业^③。农民工群体中不同的劳务输出类型影响着多子女家庭不同时期出生的安置地、抚养方式以及受教育方式,劳工家庭的子女多在三岁之后成为留守儿童,隔代抚养且就地完成义务教育。而业主家庭的孩子在学龄前由父母带在身边,学龄后从农村转向县城学习,可以看到职业分化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④。

这个时期互联网产业兴起并很快转型升级,导致农民工分布变化。东部农民工增长速度降低,中、西部的农民工增长速度加快。东部产业升级转型,互联网产业兴起,逐渐淘汰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工型农民工。农民工大量进入到快递行业,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开始逐步超过第二产业。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速农民工的流动转型,传统含义上的“农民工”概念可能被“城市新移民”替换。当前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带来我国城乡剧烈变迁,尤其是城市呈现移民化发展趋势,其移民人口数量庞大、构成多样,具体包括:汉族、各少数民族、外国人等不同的族群身份人群;本区域、本省份,跨区域、跨身份,跨国迁移的人口;劳工型农民工、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等不同职业人群;原住民、已入户的外地人、户籍地不在本地的外地人等不同的户籍身份人群等。

①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②朱永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

③周大鸣:《农民的流动与转型——以湖南攸县为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④周大鸣,程麓晓:《农民工的职业分化与子女教育——以湖南攸县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短期内这部分极具规模的多样性、异质性迁移群体在城市迅速聚集,使得迁入地区移民化程度极高,这也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的显著特征。基于我国城市移民的社会趋势和问题,“城市新移民”概念能够打破“农民工”概念的局限性,因为新移民涵盖了更多来源、职业、身份、文化水平的移民群体,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有意识在城市定居”的迁移人群。从概念界定而言,“城市新移民”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出生地与原户籍地都不在本地,在本地居住2~5年;有在城市(城镇)定居的意愿;具有合法居所;具有合法收入。主要包括以“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力型移民、凭借“高学历的知识背景和较为清晰的城市化意愿和进入策略”的智力型移民、还有依靠资金或技术运作自己的投资和产业在城市扎根下来的经营型移民^①。关注城市新移民分类和群体特征,不仅能够看到农民工本身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型具象,还能够探讨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分化对城市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以及该群体因社会与文化融合引发的社会重构。此外,将城市新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有助于在制度上逐步弥合固有的二元城乡结构。因此,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的概念和研究思路的转换,有助于推动我国当前的人口迁移研究^②。

三 中国农民工与城市化的发展

从农民工的阶段性演变历程来看,农民工与城市化发展路径、城市产业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是乡村都市化过程,即乡村在地都市化,再由这些都市化的城市逐渐带动周边进入城市化的过程^③,此过程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村庄变成集镇、原来的乡镇向市镇发展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④。乡村都市化进程吸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以乡土社会文化为背景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多元文化相接触,从而产生一种既融合乡土文明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整合^⑤。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到1998年左右,当时是一种分散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其动力来源

于小城镇底层的发展。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以后。1998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伴随城市房地产的兴起,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开始明显,并转型为一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所以,中国城市化是一个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转变的关键点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房地产的兴起^⑥。

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化。从投资环境来看,资金流入更多元化,不仅是外资,还有外省大量资金开始进入珠三角地区。加之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现在的中国已跟全球经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集镇的规模从较小、较低档次的小城镇发展,开始逐步改造升级,向具有较好投资环境的方向转化。如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小城镇的问题时,国内学术界大多把小城镇跟城市甚至大城市进行比较,觉得它的效率不高、污染严重,还有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集约的效应不高。其客观原因是当时的小城镇各自为政,各自处理用水、用电和排污问题,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都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小城镇逐渐从无序发展转向有序发展,现在的小城镇跟当年的小城镇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已成为较理想的生活环境,例如今日的苏南地区。因此,关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笔者一直是持乐观的态度。因为当社会个体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肯定会想办法改善自己生活的环境,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既是个体主体性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特性所在。

从流入的劳动力来看,城市化发展还包括吸纳大量城市新移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珠三角地区过去的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湖南、江西等地。20世纪七十八年代的广东,一个公社可能只有一个中学,很多公社甚至没有学校,学生数量也很少。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基础教育已快速发展,从内地引进了大量优秀教师,教育质量大幅提高。另外,更重要的是引进高层次人才,深圳目前是工科博士最集中的一个城市。总

①周大鸣:《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周大鸣:《移民与城市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④周大鸣:《三十而立——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

⑤周大鸣:《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⑥周大鸣:《三十而立——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

之,以上案例说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兴起跟城市的产业发展、城市化的发展紧密关联。

四 中国农民工个人研究的回顾

在知网上,以“农民工”作为关键词来搜索,目前有超过6万篇文章。在读秀数据库里,仅中文的学位论文就有3869篇。早期对农民工的称谓不一,比如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工人流动人口等,所以很难准确检索。按照文章关键词的排序,有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城镇化、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农民工返乡就业等。

笔者关于农民工的关注和研究,至今也快跨越“半世纪”。早期笔者在德国访学时,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工业化发展很快,德国曾大量引进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波兰的农民工,并与进入德国的农民工群体签订协议,即在德国打工多少年以后要求其回到祖籍国,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尽人意,以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为例,这部分土耳其人有点类似美国唐人街的中国人,他们在德国集中居住,并长期使用母语。德语是外来农民工加入德国籍的一个门槛,需要很快且熟练地使用,然而大量的土耳其人虽然在德国长期生活,但仍不会讲德语。当时进入德国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同民族成员跨国界进入德国境内,呈现城市族群多元化。这一观察给笔者较大启发。

所以,笔者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最早开拓的一个领域是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不仅包括汉族,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呈现不同民族互嵌、不同人群揉杂的城市族群景观。这意味着不同文化的、不同宗教的,甚至是不同种族的人群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城市空间里面,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要进行社会互动的,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文化的接触、交流、融合,甚至是碰撞。如果少数民族打工者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不给予适当的关注,就很容易产生“蝴蝶效应”,小事演变成社会大事件,城市少数民族打工者因具备特殊的双重身份往往遭遇族群融合、文化冲突、民族关系等问题,比如在广东韶关玩具厂曾发生过的“7·5事件”。因此,笔者以深圳民俗村和广州H社区为个案,做了有关少数民族在城市的分布与居住、性别文化

结构以及职业、社会网络、族际交际等田野调查,笔者重点关注了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并指出我国城市的少数民族呈现多元化、杂散居化的新格局,城市民族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都市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群体在都市的适应与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①。

另外,笔者也最早关注到农民工输出地,并做了湖南攸县调查。这源于笔者去深圳出差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偶然谈话。这位出租车司机告诉笔者,攸县人在深圳出租车司机里面占70%以上。深圳那么大的城市,当时出租车司机的数量超过10000人。如此庞大的流动群体为什么几乎来自一个地方?所以,笔者让自己的博士生田阡专门去调查在深圳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并以此做他博士论文的主题。然后我们又根据这些“线人”出租车司机,到攸县去做调查,看看攸县的农民工群体具有哪些特征。从调查来看,攸县外出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和转型已非常明显。当时攸县的劳动力输出有三大队伍:出租车司机、商业经营者和技能型劳工。外出务工群体分成四种类型:劳工型、技术型、业主型、企业型。攸县的劳动力输出,除了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工,一部分农民工还拥有了一定技术,通常是在工厂里做技术工人。业主型则是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劳动资本,如开出租车的、开挖掘机的。还有一种是企业型,他们大多投资开商店、办旅馆。当时我们在攸县做调查时,这四种类型中的劳工型输出已经不足五分之一。基于调查,我们的研究最终形成了关于农民工内部差异的论著《农民的流动与转型——湖南攸县调查》,并指出最初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而实际上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分化和转型。湖南攸县是一个例证,早期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工在攸县实际已经不多了。

从攸县劳动力输出的特点可以看到,大量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向城市移民的能力,可以实现劳动力真正意义上的转移,即劳动力的输出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源型输出。所以,农民工不仅是劳动力,也是携带资本、技术等重要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此外,攸县回乡农民工创业,也促进了本地经济结构的转型。如近年来攸县发展得很快,其农

^①王琛,周大鸣:《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业的发展也在向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商业化转型,本地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因此,从湖南攸县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民工的输出给本地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农民工“散工”也是笔者最早关注的一类特殊群体。学术界一直以来对企业正式雇佣的农民工比较关注,而忽略了非正式雇佣的农民工。笔者用“散工”来定义外来劳动人口中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他们既没有个体营业证件,也不属于各类企业中的合法雇佣者,从事的行业也各种各样^①。“散工”从事的行业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出卖体力劳动者,类似于打短工的性质,如搬运、修路、挖下水道等;第二类是手工业劳动者,他们干的行业比较简单,如泥瓦工、电工、自行车修理工等;第三类是提供各种定向定时服务的人员,如保姆、钟点工、老年康复人员等。其实,城市散工群体数量不少,而且分布广,典型的如重庆的“棒棒军”,重庆市山地多,道路多需要爬坡,城中人往往会请“棒棒军”帮忙背行李或搬东西,他们分布在码头等接驳点,等候着雇主来叫他们去干活。“散工”是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政府把他们叫做“三无人员”——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居所、无有效证件。此外,笔者也做了有关广州兴丰垃圾场拾荒者聚落的调查研究,描述了不同行动者(政府、拾荒老板、拾荒者和当地村民)的互动构建了垃圾场特殊的空间政治和拾荒者的社区生活。在该场域内,资本、权力、情感、文化、体验等要素相互缠绕且发生变迁^②。在城市所有的垃圾填埋场几乎都会有这样的聚落,笔者称之为“拾荒者聚落”。笔者曾在垃圾填埋场田野调查时访谈过一位开超市的老板娘,她说了一句让笔者至今记忆犹深的话“垃圾填埋场开到哪里,我的超市就开在哪里”。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研究也是笔者较早关注的主题,即农民工代际差异。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是容易区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为解决温饱问题,刚刚“洗脚上田”,寻找出路,脱离贫困,更多的是谋求生存。回流是老一代农民工显著的特征,笔者对

企业农民工的调查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打工赚了钱后,回去盖个房子就不再出来打工了,这反映了老一代农民工回流是一种“二元”体制下的主体性选择,凸显了打工是其求生存的权宜之计^③。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温饱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是问题,他们多“转工”以求发展。他们进入城市打工主要是为了寻找发展的机会,“转工”是指从这个企业频繁地转到另外一个企业,转工过程中的确存在不理性因素,但其背后却是新一代农民工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与行动策略^④。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跟他们父辈的差异是明显的,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壮大,农民工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青年农民工越来越接近城市青年人。同时,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与上一辈划分界限,乡土情感、宗族观念、父辈权威等迅速淡化。近年来,笔者的观察发现: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可能会成为农民工代际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笔者还有个“城市新移民问题对策研究”的课题。我们开展该课题的研究有三个目标方向:农民工如何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如何从流动变为迁移和如何让新生代的农民工成为国家经济转型中宝贵的人力资源。实际上,笔者在上文中讲到后三十年要靠培训农民工来发展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农民工的培训在下一步国家战略上肯定要引起重视。关于城市新移民的研究,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定居已经成为常态,中国人口流动与迁移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出现新的特征,新移民群体在基本特征、生计收入、居住状况、工作状况、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生活、心理状况上发生新的变化。立足对新移民群体的调查和研究,在概念层面上打破“农民工”概念的局限性、在制度层面上思考如何弥合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这些层面展现了我国城市移民化的趋势和问题^⑤。城市新移民也处于不断分化转型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农民工群体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能力在城市里面生活下去,如据笔者调查,在佛山就有一批专门从事

①周大鸣:《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

②周大鸣,李翠玲:《拾荒者的社区生活:都市新移民聚落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周大鸣,姬广绪:《回流的主位视角:企业农民工流动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④周大鸣,孙箫韵:《农民工“转工”研究》,《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⑤周大鸣:《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城市挖掘机工作的人,他们有的已经在佛山购房定居,孩子也在佛山上学,并且可以讲一口较流利的粤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对城市有了较好的适应。所以,笔者认为,把这部分拥有较高收入的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是解决过去流而不迁的人口流动方式的关键。当然,在转化的过程中如何提高新移民的城市认同,如何处理好原住民与新移民的关系,倡导多元和谐的文化,以及怎么样推动农民工参与城市管理,提高新移民的社会参与度等,这些问题都是影响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市民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笔者对农民工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论或概念。最早笔者提出了“钟摆理论”:户籍制度没有改变,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农民工总是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流动^①。早期因为农民工季节性的流动比较多,即根据农时不断地在输出地和输入地摆动,所以提出钟摆理论,也试图构建这样一个模型用来讨论农民工对输出地、输入地的影响。另外,伴随着钟摆理论延伸拓展,又提出“打工经济”。笔者曾在湖南、江西、四川的乡村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乡村中的外出务工人员超过劳动力总数 30%,打工收入在经济结构中占 50%以上、且成为主要现金收入来源。正是基于当时的观察,笔者提出了“打工经济”的概念,通俗而言,打工经济就是靠打工过日子。实际上,在许多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家庭成员以外出打工获取主要经济收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也是他们主要的家庭生计方式^②。另外,笔者还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二元社区”,用来说明虽然农民工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实际上他们在不同的社区。笔者主要是从制度分配、职业、收入、消费与娱乐方式、居住方式和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这种二元性^③。笔者提出“二元社区”概念也意在说明农民工进入城市与本地人长期不能完全融合的阶段性状态。所以,笔者在有关“新移民的研究”中也讲到移民与原住民的关系,实际上它是今后城市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五 中国农民工研究的几个新话题

中国经济正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农民工也面

临流动、分化、转型与发展,未来中国农民工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热点,笔者认为有几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无论是从国家战略,还是从现实的意义,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研究重点。当前要实现 2 亿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的目标,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作为切入点。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处理好城乡关系,即怎样将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城市化结合起来发展,把资金集中起来使用,这也是当前国家在精准扶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国家正在解决的,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方向。当然,对农民的市民化我们需要找出一些已经做了较好实践的样本来推广。根据笔者个人的调查经验,浙江丽水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第二个就是农民工就业岗位变化的研究。当前农民工就业岗位的变化是很大的,过去那种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需要改变。农村存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如阿里巴巴的淘宝村,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淘宝村就是一种在本地本土办企业,本村的农民在本地就业的新变化。所以,笔者特意让自己的一名博士到过去工商业并不发达的一个苏北农村做有关“淘宝村”的博士学位论文,考察在一个没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一个远离城市制造业中心的农村,淘宝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调查的结果发现,这样一个地方的淘宝村竟然发展得很好。因此,我们关于农民工就业岗位的研究就要捕捉到这样的新变化,特别是现在农村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借助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多电商企业在本乡本土发展起来。按照《2019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西部农民工的增速已经大大超过东部农民工的增速。西部农民工数量占整个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2%。从数量上可以看到农民工发展的变化,农民工就业岗位的变化可能就是导致农民工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

第三个是研究互联网时代的农民工。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能够迅速崛起,并能够挑战世界最强国,不仅是因为有大量从事金融、信息技术、计算机等

①周大鸣:《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②周大鸣:《农村劳务输出与打工经济——以江西省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③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高技术的专业人员,而且因为具备庞大的、低技术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作为支撑。201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2.91亿,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例如京东,一个企业竟然可以自己构建一个需要大量人员的物流体系,又如阳光报社、广州日报等都是自版发行,一个报社可以搭建出一套投递系统,这些系统之所以能够维持,根源就在于其背后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所以,我们的互联网产业要发展得更快,可能还要充分利用好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优势。

第四个话题是中国农民工在海外。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向外延伸,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建设在外开展,中国的农民工也随着中国企业的向外开拓走到了海外,所以号称中国有百万农民工在海外,如老挝就有大量农民工参加建水电站、建房子。同样,也有大量的农民工在海外经商,据说我国有30万湖南人在老挝经商,主要是办小超市并遍布城乡,这些农民工主要来自邵阳、邵东,这种跨境农民工是“出国不出省”。另外,“一带一路”利用中国的技术在非洲修铁路、公路,也带动大量中国农民工进入非洲,当然其中一部分是经商,如在码头办企业。上述事实说明了中国的农民工不再局限在国内,他们已经在向海外发展,而且随着中国

与世界经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未来我国农民工向海外拓展也会越来越多。大量农民工流动到异域他乡,其影响是很深远的,跨境流动也必然会产生许多有关农民工研究的新话题。

最后,笔者认为要研究农民工的培训。我们城市经济在转型,产业在转型,就业的岗位也在变化,农民工就业的领域在不断扩展,职业选择更加多样化,农民工需要培训才能更加适应这些新的变化。比如,农民工要去海外,就需要外语培训,起码需要掌握基本的生活用语。还有技能的培训,如互联网产业所需的基本技能。从需求出发对我们的农民工进行培训,刻不容缓,而且这一市场极为庞大。2.91亿的农民工,假设其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培训,也有将近3000万人,而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也就3000多万人,可想而知需要培训的体量有多大、任务有多重。因此,笔者一直有个基本判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跟农民工的培训会有极大的关系。农民工的培训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把劳动力转化为多元化的人力资源,这样我们就不仅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那么中国的发展就会加速,中国的未来也会更美好。

A Half Century Stud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Personal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ence

ZHOU Da-m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80s, the author studied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of migrant workers. Domestic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asual workers, urban minorities, urban new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ization, while foreign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overseas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t present,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force flowing to the city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of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s are distributed in all parts of China and various industries. They have a wid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closely related to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personal research; research trends

(责任校对 莫秀珍)